



今夕何夕：公历与公元的由来

刘凡超

人类对时间的感知源于昼夜更替、四季轮转，但是时间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那我们如何确定今天，或历史上某一天到底是哪一天呢？这就需要首先人为设定一个时间参照点，作为记录年份的开始，然后根据距离这个参照点的时间长度来确定具体年份。这个时间参照点就叫“纪元”。“纪”通“记”，记录之意。“元”是起、始之意。“纪元”，即记录的开始。这种记录年份的方法就叫“纪年”。由于对纪元的不同选择，世界上诞生了很多纪年法，如：干支纪年法、历史纪年法、帝王年号纪年法、天文纪年法等。但是纪年只能解决年份问题，具体的日期问题则需要通过“历法”将一年划分为月、周、日等更小的时间单位来确定。世界上的历法也有很多，主要分为以朔望月为基本周期的阴历、以回归年为基本周期的阳历及以朔望月和回归年周期相结合的阴阳合历三种。历史上不同历法对年、月、周、日的设定相差甚远。如果我们翻开日历，日期显示是公元2022年12月9日星期五。“2022”这个年份，即由“公元纪年”来决定，“12月9日星期五”则由“公历”来决定。那么“公历”与“公元”是怎么来的呢？这还得从两千多年前的罗马讲起。

儒略·凯撒解决了“胜仗在哪天”的问题

法国著名哲学家伏尔泰曾有一句戏言：“罗马人常打胜仗，但不知是哪一天打的。”伏尔泰为何这样说呢？因为古罗马一度历法非常混乱，甚至曾出现寒暑颠倒的情况。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公元前46年，罗马执政官儒略·凯撒聘请埃及天文学家索西尼斯以埃及的太阳历为蓝本，修改混乱的罗马历法。修改后的历法一年为365.25日，为计算方便，设置平年、闰年分之。平年365日，闰年366日，每隔三年置一闰年。一年设12个月，奇数月1、3、5、7、9、11月为大月，每月31天；偶数月4、6、8、10、12月为小月，每月30天；2月因是罗马行刑的月份，被认为不吉利，大家都愿意缩短它，所以被定为特殊的小月，平年为29天，闰年30天。

为了彰显儒略·凯撒的功绩，此历被命名为儒略历。为了成功树立凯撒的权威，罗马元老院决定将凯撒出生的7月改称为凯撒的姓氏儒略(Julius)。新历从公元前45年元旦起在罗马使用。儒略历十分接近回归年(地球绕太阳一周的时间,365.2422日),是当时世界上非常精确的历法,它成功地解决了罗马“胜仗在哪天”的问题。儒略历也因此成为后来很多国家共同使用的历法,从而奠定了今天公历的雏形。

奥古斯都搞乱大、小月设置 君士坦丁引入星期制

公元前44年，在儒略历实行一年后，儒略·凯撒不幸遇刺身亡，屋大维继任。为了显示自己的地位并不低于凯撒，屋大维用修改历法的方式树立权威。因为出生在8月，他从2月抽出1天加在8月上，使8月也成为大月，并将8月改成他自己的称号“奥古斯都”(Augustus)。除此之外，他还把8月份以后的大小月全部加以对调。这样改动后，1、3、5、7、8、10、12月为大月，每月31天；4、6、9、11月为小月，每月30天；2月仍为小月，平年28天，闰年29天。从此，大、小月的设置与奇偶数无关，变得毫无规律。

儒略历创制时只有年月日的组合，并无星期。以7天为一个周期的计日制度起源于古巴比伦。罗马帝国君士坦丁大帝于公元321年将星期制正式引入儒略历。

狄奥尼修斯创制公元纪年

尼西亚会议并未规定统一的纪元，因此各国仍使用原有的纪年方法。如，罗马帝国以始建罗马城或戴克里先称帝之年为纪元，希腊以召开第一次奥林匹克运动会



的那一年为纪元。公元532年，一位名叫狄奥尼修斯的天文学家借教皇要求重新编写教会年历表之机，摈弃了先前以罗马建城或戴克里先称帝为纪元的惯例，而将自己推算出的耶稣·基督的生年设定为新的纪元，称此年为元年。这一年相当于我国汉平帝元始元年。后来这种纪年法逐渐超越宗教范畴，淡去宗教意味而被世界各国广泛使用，因此被称为“公元纪年”。“公”，共、同之意，“元”，起、始之意，“公元”的字面意思就是“共同的第一年”。

格里高利创制现行公历 与“凭空消失”的十几天

儒略历创制时虽然是当时世界上非常精确的历法，但仍存在每年比回归年长11分14秒的微小误差。这就导致大约每128年日历就会比天时慢1天，每400年就会慢3天。到了公元1582年，天文观测发现，春分日不是发生在3月21日，而是在3月11日，这说明日历和天时已经相差了10天之多。这种情况下，进行历法改革已经势在必行。

公元1582年3月1日，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召集天文学家对儒略历进行修订，后世称为“格里历”。格里历基本上保留了儒略历原有的框架，包括年、月、周、日的组合关系和每四年置一闰的规律。其改革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针对过去1600余年累积的10天误差，采用直接在新旧历交替中取消10天的办法。即，

规定儒略历1582年10月4日星期四的次日为格里历1582年10月15日星期五；二是针对未来儒略历每400年仍会慢3天的缺陷，采用在400年中取消3个闰年以减少3天的办法。即，规定凡不能被400整除的“世纪年”，改闰年为平年。如1600年为闰年，而1700年、1800年、1900年则为平年。修改后的历法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儒略历的误差，基本上使春分长期维持在3月21日左右，平均年长365.2425日十分接近回归年，其精度比儒略历大大提高。

在随后的350年中，格里历与儒略历在欧洲并存，以至于同一历史事件在不同历法中表达为不同日期。

由于国际交往和通讯事业的发展，使各国逐渐认识到使用统一历法的重要性。到20世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采用了格里历。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儒略历与格里历之间的误差，世界各国在改历过程中都“凭空消失”了10~13天。如，英国曾有文物造假者不谙此事，在某艺术品上刻上1752年9月7日，而被天文学家识破骗局。因为英国在1752年9月1日改历，其历史上这一年根本不存在9月2日到12日这11天。我国在辛亥革命后，开始采用格里历，并沿用至今。正因为使用的人多了，此历法就逐渐成为了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公历”。

需要说明的是，因“公历”与“公元纪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因此世界各国在选取使用时存在一定差异。当然，近代以来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是将公历和公元纪年一起组合使用的，这也致使很多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将二者混为一谈。

新公历，“世界历”？

格里历虽然是当今世界广为使用的公历，但其自身仍存在一些缺陷。如：其平均年仍比回归年长0.0003日，这一误差会导致每隔3333年日历就比天时多出1天；月份、季度和半年所包含的天数分布不规则；日期与星期之间无固定对应关系；岁首日期没有天文意义等。为了克服这些缺陷，世界各国改历家一直尝试对格里历进行修改。一战后，国际联盟成立，曾设历法改革委员会，并向各国收集改历方案。二战后，联合国成立，也先后两次讨论过采用“世界历”的议案。上个世纪90年代，我国学术界曾掀起过一轮探讨改历问题的热潮，“联合国改历委员会预告2000年将启用新公历”的消息也曾经见诸报端。然而，改历是一件特别重大且十分复杂的事，虽然众多改历家一直在努力，但修改历法的时机尚未到来。
据《学习时报》

潘达于捐献大孟鼎和大克鼎

清道光年间，大孟鼎出土于陕西眉县礼村，一同出土的还有形体较小的孟鼎，故将大鼎称为“大孟鼎”。同治七年，收藏家潘祖荫从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手中获赠大孟鼎。

清光绪年间，大克鼎出土于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同出者有克鼎七件，为将它们区分开来，故将大鼎称为“大克鼎”。大克鼎出土后不久亦即为潘祖荫所得。

潘祖荫去世后，其弟潘祖年将大孟鼎和大克鼎一同运回苏州老家收藏。潘氏后人为保护二鼎倾尽全力。尤其是在抗战全面爆发以后，主持潘氏家事的潘达于女士无奈决定将二鼎再次入土埋藏，躲过日军的数次搜查，得以安然保护。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慎重考虑，潘达于认为“有全国影响的重要文物只有置之博物馆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1951年，即向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无偿捐献青铜重器大孟鼎、大克鼎，以及其他珍贵文物200余件。潘达于在书信中写道，全家心愿是国宝“贮藏得所、克保永久”。

1951年10月9日，《新民晚报》刊登消息《潘达于捐献两古鼎》，提到“潘家以其累世珍藏古物捐献政府，不但表示其对政府的热爱和信赖，同时对于新中国的文化也是一种贡献。”

1952年，上海博物馆建馆伊始，历经劫难的二鼎得以展出，轰动全国。1959年，大孟鼎应征北上，入藏于

中国国家博物馆。

潘达于那时生活并不宽裕，还参加了里弄生产组，学习在玻璃上钻孔。当时，政府曾奖励潘达于一笔钱，她还把这笔钱也捐给了抗美援朝将士。其后，潘达于又陆续捐出大量藏品，如1956年捐赠99件字画、1957年捐赠150件字画等。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沈周《西湖名胜册》、弘仁《山水卷》、倪元璐《山水花卉册》等都是她的捐赠。

潘达于将祖传文物典籍悉数捐赠给国家，自己的生活却一直过得十分简朴。1996年，当记者采访时年91岁的老人时，言及当初捐赠的动机，老人大声说：“因为相信共产党呀！”
付裕 据《人民政协报》